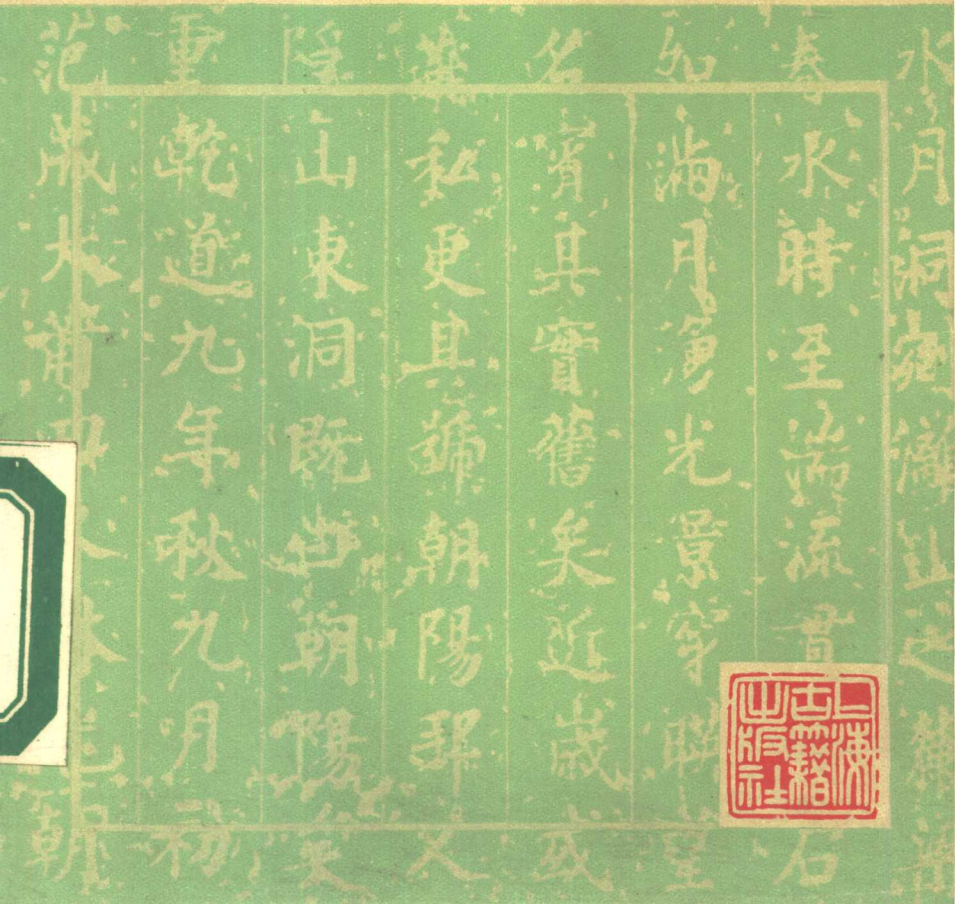


# 古籍丛书概说

刘尚恒著



# 古籍丛书概说

刘尚恒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丛书概说**

刘尚恒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88,000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5325-0601-0

Z·68 定价: 1.85 元

## 序

刘尚恒同志既成《古籍丛书概说》一书，畀余读之，三复赞叹，不能无言。

余始识尚恒同志在一九七九年。时予以阅书至馆，得与相见。观其于学术之源流、部类之开合、版本之款式行格、装帧之沿革变迁，殫见洽闻，已深异之。问知其早年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系，嗣在天津馆负责学术咨询工作，博闻强记，宜其淹雅也。

窃尝惜一些图书馆，为藏书计者多，而为用书计者少。使书皆束阁，则与焚之何异？然欲用书亦实难。前人所以视目录为学中第一要事者，固由考镜源流，亦由非知书则无以索书也。而书中最要而难得之资料，大多在丛书之中。欲用丛书中之资料，则难之又难。凡亲尝治学之甘苦者大约皆能知之。然初学者实未必知也；而知之者或矜为秘得不以告人；即或告人，而由言之不详，人亦未必信也。

尚恒同志深知丛书在治学中之重要作用，又能以读者之乐为己乐，举己之心得体会，倾囊倒篋，用以告人，其用心之美，尤足称也。人之得是书者，不特可知丛书之源流，更能知其价值所在与利用之法，将使书尽其用，而人才日以

出，学术日以盛，盖可必也。

孟复束发受书，老而无成，然于知书、求书、用书之甘苦，实深知之；于后来学者之学会使用丛书，实深望之。读是书而欣然以喜，其不能已于言者，岂偶然哉？惟是病榻缠绵，艰于作字，只好用文言写成，意或未尽；然区区之心，则与尚恒同志同也。使人知用书，书尽其用，其于文明建设之神益，岂鲜浅哉？

吴孟复

一九八五年三月

## 导 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历史上遗留下被人们喻为“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便是最具体、最生动的证明。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丛书是其中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

从唐五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到辛亥革命止，我国究竟有多少古籍，至今众说不一，少的说有“不下五、六万种”（《中华书局整理古籍成绩可喜》，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13日第4版），多的说“总数在二十万种以上”（王树伟：《我国古籍知多少》，载《百科知识》1981年第12期），北京图书馆杨殿珣先生根据有关目录估计为十五万种（《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载《北图通讯》1979年第1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根据有关目录估计为八万到十万种（《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载《解放日报》1982年5月4日第4版），而丛书所收的古籍，仅《中国丛书综录》一书达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之多，加上佛藏汇刻及“新学”丛书、待补入的丛书所收子目估计一万种，总数当有五万种左右，这样就占整个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以上。不但我国古代各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典籍基本上包罗在丛书之中，而且

众多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杂著，往往舍丛书不可得。可见古籍丛书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了解和研究古籍丛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典籍，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书试图对我国古籍丛书的概念、起源、发展、类别，以及它的价值和利用等问题，作一初步阐述，帮助有志于研究古籍的青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 目 录

序	吴孟复	(1)
导 言		(1)
第一章 古籍丛书的概念和起源		(1)
第一节 古籍丛书的概念		(1)
第二节 古籍丛书的起源		(5)
第二章 古籍丛书发展简述		(11)
第一节 宋元古籍丛书		(11)
第二节 明代古籍丛书		(14)
第三节 清代古籍丛书		(18)
第四节 近代古籍丛书		(25)
一、《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		(25)
二、其他重要古籍丛书		(28)
第五节 建国后古籍丛书		(32)
一、出版情况		(32)
二、主要成就		(37)
三、不足和希望		(41)
第三章 古籍丛书的类别		(43)
第一节 古籍丛书在传统目录中的立类		(43)



第二节	古籍丛书的分类	.....	(45)
第三节	综合性古籍丛书的种类	.....	(50)
<b>第四章</b>	<b>古籍丛书的价值和利用</b>	.....	<b>(54)</b>
第一节	古籍丛书的价值	.....	(54)
第二节	古籍丛书的利用	.....	(62)
<b>附录</b>	<b>七十五种综合性古籍丛书简介</b>	.....	<b>(73)</b>
<b>后记</b>		.....	<b>(135)</b>

# 第一章 古籍丛书的概念和起源

## 第一节 古籍丛书的概念

对于古籍的范围，现在人们公认为包括先秦至辛亥革命前产生的文字典籍，而对于什么是丛书，历来就众说纷纭了：

清钱大昕以丛书之意为“荟萃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百川学海》）

清王鸣盛以为丛书是“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汇刻。”（《蛾术编》卷十四《合刻丛书》）

清李调元说：“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

清末缪荃孙则以“至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者为丛书（《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

近人刘承干说：“杂取古今人所著，汇为一部，而标立名目，号为丛书。”（《重印岱南阁丛书序》）

近人傅增湘谓“集诸书而镂于版，因事立义，名之曰丛书。”（傅氏《抱经堂汇刻书序》）

近人叶德辉以为：“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书林清话》221页，1959年中华书局）

近人汪辟疆说：“总聚众书而为书者，谓之丛书。”（《目录学研究》96页，1955年中华书局）

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说：“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的书。”（《中国丛书综录·前言》，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版《辞海》释丛书为“编印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1979年版）。

上述说法，其共同点都是强调丛书的汇总诸书意思，不同的是在汇总的内容及范围上有分歧。钱大昕指出了“荟萃”，但不一定非“古人书”，汇集和编纂同时代的所谓“今人”之书也可以；王鸣盛说是“汇刻”，但也不尽是“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也有大部头著述；缪荃孙从丛书所收书的完整性来确定，则界限过严、过窄；叶德辉、刘承干之说，既强调汇总，又指出杂碎，较前人合理得多，但并不一定非“举四部”（即经、史、子、集）不可，包括二部、三部也行，甚至汇集兼有各类的同一部别的多种著作而成丛书；上海图书馆则侧重其功用，至于汇集的是否“重要著作”，那是因编纂者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傅增湘只注意了“镂于版”，而忽视了还有未曾付于刻印的抄本、稿本的情况。至于丛书的汇总的数量，差别是很大的，少的只有两种，多的可达千种，李调元所说的“数人”，那是非常含混不清的。

下面，我们不妨对“丛书”两字作一简略考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丛，聚也”。《尚书·无逸》有“是丛于厥身”，《尚书·益稷》有“元首丛脞哉”。前者汉马融注：“丛，总也。”后者唐·孔颖达引汉郑玄说：“丛脞，总聚小小之事以

乱大政”，引申为细碎之意。《后汉书·冯衍传下》有：“恶丛巧之乱世兮”，唐李贤注：“丛，细也。”可见丛字作为形容词、动词的含义有二：一是总、聚的意思；一是细碎、烦琐的意思。此外还有作为名词是指“丛生的树木”，如《淮南傲真训注》：“聚木为丛。”新版《辞海》，于丛字释得很明白。

“丛书”两个字连用在一起，最早见于唐韩愈的《剥啄行》一诗，云“门以两版，丛书于间”（《韩昌黎集》卷四《古诗·剥啄行》），但这并不是书名，而是说关上门，家中聚集着许多书可读，这是诗人为远俛避谤而闭门谢客的话。丛书第一次用作书名的是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其序云：“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不遗大，可知其所容也。”可见这是陆氏的诗文杂著，而以其书丛脞、细碎，遂以名之，故《唐书艺文志》取其书入丁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集录之别集类。到了宋代，王楙有《野客丛书》，而其序云：“仆间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帙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论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可见这是王氏一部有关考订辨证的杂著，故《宋史·艺文志》取其书入子部小说家类。陆、王二人所用的“丛”字，均取细碎、脞杂的意思。后来的“丛说”（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丛谈”（如宋陈师道的《后山丛谈》）、“丛考”（如近人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谈丛”（如近人谢国楨的《明清笔记谈丛》）等，也均取细碎、脞杂的意思。

显然丛书的概念，从广义上讲，就是汇集两种以上专书（不论所集专书是否完整和内容的繁杂与否），别题一书名而成为另一新的著作物。从狭义上讲，其所汇集的两种以

上的专书，不但首尾完整，而且内容上必须超过两个部类以上（以古籍的“四分法”为准），这样才既含总、聚的意思，又包含细碎、胜杂的意思，这样的狭义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清初王晫说：“夫丛者，聚也，或支分子盈尺之部，或散见于片楮之间，裒而聚之也；丛也者杂也，或述经史、或辨礼仪，或备劝戒，或资考订，事类纷纶，杂而列之也。”（《檀几丛书序》）清末朱记荣说：“尝考之书以丛名，其义有二，一曰丛积，不名一类。……一曰丛胜，犹言细碎也。”（《槐庐丛书序》）可是人们往往并不严格区分广义和狭义概念，甚至以广义概念代替狭义概念，所以后来人们把丛书又叫做汇刻、丛刻、丛抄、汇编、汇刊、丛刊（至于按一定期限连续出版的期刊，也有称丛刊的，则另作别论）。

然而，不论执广义概念，还是执狭义概念，在汇集成丛书时，都必须有统括群书的总书名，否则不能视为丛书。譬如明高启的《高青邱集》包括《诗集》十八卷、《遗诗》一卷、《扣舷集》一卷、《凫藻集》五卷；清张象津的《白云山房诗文集》包括《诗集》三卷、《文集》六卷、《考工释车》一卷、《离骚章句义疏》一卷、《等韵简明指掌图》一卷。即使某书包括二人、三人的著作，只要没有总书名，也均不能视作丛书。如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中包括其子朱昆田的《笛渔小稿》十卷。明陈际泰的《太乙山房文集》中包括陈士凤的《孝感论》一卷、陈士骥的《陈孝逸论》一卷，这种补益附刻的现象，到现代常题作“外几种”，如岑仲勉的《唐人行第录（外三种）》其所附的是作者的专著《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三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丛书中专书汇集与总集中篇的汇集应该区别开来，如宋代李昉的《文苑英华》、明代王志坚的《四六法海》、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属于通代文总集。宋代姚铉的《唐文粹》、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铁保的《熙朝雅颂集》等，属于断代文总集。它们着重汇集的是诗文篇章，即使保留原作者的集名，而由于删削过多，已不能独立成书了。第二，丛书中汇集的专书虽不是原书全部，但能独立成书的摘抄本（如宋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辑录本（如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裁篇别出本（如清罗汝楠《历代地理志汇编》），都可视作丛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所收各书能否独自成书（参见：施廷镛《丛书概述》，载《图书馆季刊》1963年第1期）。

事实上，在我国丛书发展过程中，所谓广义概念也好，狭义概念也好，多数情况下，它们并行不悖，只是因为评论者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 第二节 古籍丛书的起源

由于人们对古籍丛书概念认识上的分歧，关于它的起源说法自然是很不一致：

清钱大昕以为“始于左禹锡（圭）《百川学海》（《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百川学海》）。

清王鸣盛以为“其在宋则石庐龚士禹有《五子合刻》、鄞山左圭禹锡有《百川学海》，……”（《蛾术编》卷十四《合刻丛书》）。

清法式善说：“考丛书古无刻者，宋温陵曾慥始集《类

说》，自《穆天子传》以下二百五十种，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是为丛书之祖。”（《陶庐杂识》卷四）

清李调元以为“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又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是为丛书之祖。”（《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

清缪荃孙指出：“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于咸淳癸酉（九年，1273），先七十余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

近人汪辟疆说：“丛书之制在周汉已开，《乐正》四术，《诗》存三家，《书》有六体之殊，《易》有十翼之作，丛书之源，远肇于此。”（《目录学研究》96页，1955年中华书局）

近人罗振玉说：“客有问予丛书所自昉者，予应之曰：丛书尚矣。勒石之世，已有丛书，镂木之始，最先刻者亦丛书也。……及汉季立石鸿都门，乃会诸经合刊之，厥后而魏而唐，十二经备焉。释氏经论初也各自为书也，隋僧静琬聚诸经论勒石房山，至辽始尽一藏，其石至今尚存。鸿都石经、房山佛藏，谓之非丛书得乎哉？是勒石之世，已有丛书之明证也；墨板初兴，蜀中毋氏刊《九经》于前，后唐长兴雕《五经》于后，宋开宝中敕蜀中雕《大藏》，后以经板赐显圣寺，予在海东尚见其佛本行集经残卷，此非镂木之始最先刻者为丛书之明证乎？”（罗氏《适园丛书序》）

近人姚名达则说：“《诗》、《书》者，上古之丛书也。”又说：“纵使不敢主《诗》、《易》、《礼》为丛书之书，岂《汉志》所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杨雄所序三十八篇》亦不敢认为

个人自著丛书之始乎？”他批评“近人推溯丛书之源仅及宋末，此其闾陋可笑也。”（《中国目录学史》378页，1957年中华书局）

我以为，这些歧意殊说的出现，是由于一是缺乏对丛书产生的考察，二是混淆丛书概念的狭义与广义之别而造成的。

谈到丛书的产生，已故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有个很好的见解，他说：“余则恒以丛书之名盖由类书演变而成者也。类书中，宋有曾慥《类说》一书。其书流传甚罕，余曾见明抄本，汇辑古今著述约数十种，然皆删节不全，此已肇丛书之端，至元陶宗仪《说郛》，近人汇刻书目，始列入丛书，而《四库提要》则列入子部杂家杂纂之属，其书虽在宋左圭《百川学海》之后，而其体例，实可窥见丛书与类书演变之迹。”（《丛书刊刻源流考》，载《明清笔记谈丛》202页，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可惜谢先生未能作进一步论证。

类书与丛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直接取材于众书，且内容庞杂（然与子部杂家类的杂学杂纂，如唐魏征的《群书治要》不同，它们的内容未经过编纂者加工），所不同的是，类书多有特定的编纂体例，或以分类，或以韵目，或以字头部首，或以字头笔划，以便人们按图索骥地检索、查找，而丛书无此编纂体例，不供人们作检索查找，所以前者属工具书，后者属普通阅读书。我们试将《类说》和《说郛》共同收录的《番禺杂记》加以比较，就可发现二者所录内容相同而体例有别。《类说》先录书名，次列为“五羊”、“瘴母”、“鬼市”三词目，后收原文，而《说郛》则不标词目，直录书名和原文。



显然《类说》的编排是以所收录书书名作为纲，下列词目，兼有类书、丛书二种体例特色，而《说郛》则去掉类书列词目的体例，只具丛书体例，由此我们也可窥见丛书从类书脱胎的痕迹。

我国类书始于魏(公元三世纪初)的《皇览》，这是一部由儒臣们为魏文帝曹丕“稽查考核”而编纂的书。而丛书的出现较之晚得多了，大多数人认为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初的南宋。因为这时候一方面学术著述(即图书)较以前成倍地产生。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图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极方便的条件，人们需要的书多了，并且较前也容易得到，象过去那样依靠手抄、摘编、汇纂诸书的办法已经不敷应用，于是依靠印刷术直接汇编诸书的方式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丛书的产生。

就丛书的概念而言，首先应指书的汇编，而汪辟疆则把对同一书的注释、解释汇编也当作丛书(如《十翼》不过是对《易》的解释)，姚名达则又把篇的汇集也算丛书(如《诗》，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总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丛书概念既有狭义、广义之分，而狭义概念才是它的本义，它要求既符合总聚，又符合胥杂，同部类的汇集而成的专类丛书(如汉熹平《石经》等)虽然产生在异部类书汇集而成的综合丛书之前，由于不符合丛书的本义，历史上人们均不把它们视作丛书(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丛书在传统目录中的立类》)。

从丛书的狭义概念出发，我国最早的综合性丛书，当推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是书辑成于嘉泰元年(1201)，